

# 实质代表制与实际代表制

## ——美国制宪时期的代表理念之争

黄小钊

**提要：** 实质代表制和实际代表制是政治代表制的两种主要代表观。英国是近代代议制政府的首创者，但一直受到混合政体的影响，使得两种代表理念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显现。直到美国革命的爆发，尤其是在美国制宪会议期间，实质代表制和实际代表制之间的冲突才得以凸显，成为各方最主要的争执点之一，并极大地形塑了美国共和代议制政府制度的设计与安排。

**关键词：** 实质代表制 实际代表制 美国制宪时期 代表理念

作者黄小钊，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6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在政治学领域，“代表”同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一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词汇。但是，“代表”一词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内却并没有享受同上述词汇同等的待遇和地位，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直到近代代议制政府的确立才引起人们的关注。根据汉娜·皮特金的考察，“代表（represent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的“representare”，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意指“在某种意义上使某些事物再现，尽管它在事实上或实际上并未出现。”可见，“代表”一词的初始含义与自由、民主、平等、政府等概念全无联系，其政治领域内的含义及内涵是经过漫长的演变后才具有的，如政治代表、代议员、代议制等。“代表”的政治意涵之所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最为重要的

因素之一就是近代代议制政府的出现，因为它要求人们选举代表参与立法，而不是每个人进行立法。英国是代议制政府的首创者，“代表”一词的意涵曾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并有过精彩的论述。但是，“代表”的理念和制度，虽然在英国有好几个世纪的发展，然而，在“混合政府”及“实质代表论”的重重包裹下，“代表理念”所蕴涵的“代表”能量，一直都没被释放出来。”直到 18 世纪北美革命的爆发以及美国共和代议制政府的建立，尤其在美国制宪会议时期，代表理念所蕴涵的能量才得以充分释放出来，并成为制宪人士最为关注且又难以回避的议题之一。

Hanna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8 - 9.

根据皮特金的考察，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已经意识到代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论述，但并不全面。埃德蒙·伯克是最早对代表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之一，但他主要是从议员角度进行考虑，其观点集中体现在 1774 年发表的《对布里斯托尔选民的演说》中。见 Hanna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陈志瑞、石斌主编：《埃德蒙·伯克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年，第 77 - 81 页。

张福建：《北美立宪前后“代表理念”的争议：一个革命式的转折》，《政治科学论丛》1999 年第 10 期。

戈登·伍德指出，在美国革命期间，代表是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见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 - 1787*,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p. 164.

## —

《独立宣言》发表后,北美各个殖民地开始起草州宪,但是,自各州宪法起草之始就受到代表问题困扰,其中,尤以新英格兰地区的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问题最为严重,因为这些地区受革命爆发前那场政治辩论的影响最深。北美殖民地居民通过那场政治辩论,深化了对政治代表理念的理解。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城镇,不管大小远近,都希望在议会中能实际上被代表以及拥有平等的代表权。他们认为,“实际上被代表”意指议会代表由选民亲自投票产生,而拥有“平等的代表权”则意指每个城镇在议会中都必须拥有同样的代表名额。对于前者,大小城镇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于选举资格的限制,即财产、居住地、年龄、性别等限制,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分歧。大小城镇关键在于对“拥有平等的代表权”有着不同的理解,一些地处康涅狄格河的边远小城镇认为,一个完善的代表制是他们自由的唯一保障,代表名额的分配不能依赖其税收和人口,平等的代表制——每个城镇一位代表——适合于所有城镇,不管其规模大小。而波士顿等大城镇则强调,议会的代表名额分配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即与各个城市的财富与人口数量相匹配,因为他们所缴纳的税额和所做贡献更大。如约翰·亚当斯就说:“每个城镇拥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不管有些乡镇的人数六倍于或财富十二倍于其他乡镇,是对首要的自由原则的公然违背。”《宾夕法尼亚宪法》更是宣称:“在任何时候,代表名额与纳税居民的人数之间保持一定比例都是维护自由,以及保证多数人的意志成为法律的首要原则。”

代表理念的这种歧义在各州商议组建邦联和制定邦联条款时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当时,为了协调和指挥统一的反英斗争,弗吉尼亚州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北美宣布独立、与外国缔结盟约以及组建邦联。该提议为大会所接受,并随后任命以约翰·迪金森为主席的委员

会起草邦联条例。在起草邦联条例的过程中,代表权问题成为各邦之间最主要的争焦点之一。以弗吉尼亚为代表的大州坚持按人口或财富比例分配代表,而以康涅狄格为代表的小州则要求平等分配代表——即一州一票。由于弗吉尼亚等大州在大陆会议中占少数,使得代表权的分配方式最终沿袭了大陆会议一州一票的规定。《邦联条例》在其第二款、第五款、第九款和第十三款中明确规定,“各州均保留其主权、自由与独立。”“每当召开国会,决定合众国的问题时,每一州将拥有一票。”“决定战争与和平、派遣和接受大使、缔结盟约、铸造钱币等重要权力都必须经九个州的同意才能行使。”“邦联协议的每一款,将被每一州不加以违反地遵守。……今后亦不得修改其中任何条款,除非由合众国国会批准作出修改,并在此后由各州立法机构予以肯定。”这四条款有着两方面的政治意涵:一方面,体现了小邦的平等代表理念,反映了北美各殖民地强烈的州权意识和地方自治传统;另一方面,则导致邦联体制的运转有赖于各州及各州议会的支持,给邦联未来的发展留下隐患。布尔斯廷曾对依据邦联条款所组建的邦联政府评价道:当初努力使各个殖民地在一个新的中央权威当局下联合起来时,根本不是想要建立新的“政府架构”或制定宪法,……它们所谋求的不是一个中央政府,而是(用罗德岛总督库克的话来说)“邦联条约”,它不一定是永久性的联盟,而主要是(有些人认为完全是)作战的联盟。约翰·亚当斯则认为所建立的邦联国会“并不是一个立法议会,也不是一个代议议会,不过是一个外交大会而已。”可见,邦联时期邦联政府的软弱无力以及议会议事效率的低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北美各殖民地持有的代表理念所造成的,并由此促使北美有识之士为改变现状而商议新的政治架构,即1787年的制宪会议。

在制宪法会议召开之前,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约翰·亚当斯就指出,“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组建一个代表机构,对此应该给予特别重视。”就制宪会议的进程来看,亚当斯的预言得到了验证。制宪会议原计划于1787年5月14日召开,但因当天到场

李剑鸣教授对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政府之间那场政治辩论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探讨。见李剑鸣:《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 - 1787*, pp. 187, 171, 171.

邦联条款的最主要的争焦点在三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邦联国会代表权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各州分摊战争及其他经费的比例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对西部土地的管理权问题。见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J·艾捷尔:《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1、32、36、37页。

丹尼斯·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508、508页。

John Adams, *Thoughts on Government*, in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Vol. IV, 1850 - 1856, p. 195.

的法定邦数不足,只好延期等待。直到5月25日,有7个州的代表到会,达到法定人数,制宪会议才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7日结束。其中,5月30日,6月9日和11日,以及6月27日至7月16日,都是在辩论同代表相关的问题,主要是各州的代表权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1788年,代表问题跟1776年一样都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在美国制宪会议期间,各州代表在议会的组织结构、代表的产生方式、代表的适当人数、代表的任期、代表与选民的关系以及选民的资格等代表相关问题上争执不下。在5月29日,弗吉尼亚州代表伦道夫提出《弗吉尼亚方案》,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方案规定:“全国议会由两院组成,第一院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第二院议员由第一院从各邦议会提名的适当人数中选举产生;议会席位的分配根据各邦的财政贡献或各邦自由居民的人数,按比例分配;设立全国行政官,由全国议会选举产生”等。该方案明显代表了大州的立场,如果议会席位根据此方案分配的话,弗吉尼亚等大州将完全控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因此引起了以新泽西为代表的小州的担心。于是,会议讨论几天后,新泽西州代表佩特森提出《新泽西方案》,得到了州权主义者以及小州的支持。这个方案规定:“全国议会为一院制,议会议员由各州立法机关产生;各邦在议会中拥有平等的表决权;行政部门实行委员会制,其成员由全国议会选举产生”等。

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大州强烈支持弗吉尼亚方案,而康涅狄格、特拉华、马里兰等小州则坚定地支持新泽西方案。大州的代表认为,议会席位的分配理应以各邦所作的财政贡献和人口数量为基础,这才是公平的代表制。宾夕法尼亚代表威尔逊强调:“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人民,同等数量的人民,应该拥有同等数量的席位,不同数量的人民,应该拥有不同数量的席位。”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巴特勒也赞成席位的分配要按各邦所作财政贡献的比例分配,并补充说:“钱就权,各邦在政府里的分量,应该与他们的财富成比例。”而小州的代表则坚持小州与大州的席位应该平等,否则小州将遭受大州的压迫。约翰逊就强调,“不让各邦以有效的方式参与总体政府,不给各邦以平等自主的

表决权,不让它们在总体政府中拥有捍卫自己的能力,就实现不了他们的目的,保存部分主权,也就是一句空话。”针对大州所说的贡献大,相应的代表权也大,新泽西代表佩特森用一个形象的对比反驳道:“一个贡献多的大邦,就要比一个贡献少的小邦拥有更多的投票权,就像一个富有的公民,就要比一个贫寒的公民拥有更多的投票权一样,没有道理。如果甲的财产衡量出来是乙的40倍,甲是否就有理由拥有乙的40倍的投票权呢?这种原则永远不会得到承认,如果承认,那么乙就会完全听凭甲的摆布。”此时,制宪会议陷入僵局状态,各州代表权问题妨碍着议会继续进行。因此,富兰克林提出一项动议——即从每天上午开始议事之前,先举行祷告,祈求上苍协助,保佑讨论的进行。新泽西代表布瑞利则提议——大会主席应该给新罕布什尔州的行政官写封信,告知会议议事悬而不决,需要该邦代表立即前来开会。但是,这两人的提议都没有为大会所接受。

直到6月29日,康涅狄格州的威廉·约翰逊提议组建两院,其中一院由人民代表组成,另一院由各邦代表组成,才使得会议得以继续进行。威廉·约翰逊的提议为大会所采纳,并任命一个由11人组成的委员会对此进行研究。该委员会于7月5日提出两条相互依存的报告,即第一院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每40000居民产生一名议员,居民人数不足40000的邦得产生一名,并专享所有筹款和拨款提案、固定联邦政府官员年薪的提案的权力,第二院不得更改或修正;第二院则每邦拥有平等代表权。通过十天的辩论,这个妥协的方案最终为会议所接受,此折衷方案亦被美国宪法史学家称之为“伟大的妥协”。宪法最终获得制宪人士绝对多数的支持,但亦有少数几位代表拒绝签名,即伦道夫、梅森、格里。这三人是几个大州的制宪会议代表,因此,他们拒绝签名引起了会议在场人士的忧虑。汉密尔顿就说道:“几位有影响的人物反对,甚至拒绝签名,可能引起无穷后患,燃起潜在火花;拥护宪法的热忱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拒绝签名犹如釜底抽薪。”<sup>①</sup>果然,宪法在各州——尤其是弗吉尼亚、马萨诸塞以及宾夕法尼亚等大州——的批准历程证实了汉密尔顿的担忧。

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9页。

J. H. Ferguson, D. E. Mchenry, *Element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54, pp. 13, 14

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8、100-101、177、97、238、244、267页。

① 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下册),第778页。

## 二

合众国宪法一经公布后,立即招致众多人士的对,多数州都出现了支持宪法的一方——即联邦党人,以及反对宪法的一方——即反联邦党人。联邦党人以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代表,为宪法辩护而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麦迪逊所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十篇对代表理论问题进行了集中的阐述,成为理解联邦党人代表理念乃至美国政治思想的关键。反联邦党人则以梅森、格里、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等人代表,他们主要以当时流行的小册子来表达其观点和立场,与联邦党人针锋相对。随着各州相继召开批准宪法的代表大会,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针对新宪法的众多条文内容展开了激烈辩论,其程度并不亚于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政府之间的那场政治辩论。

反联邦党人的代表制理念是与他们对共和制政府的信念相联系的——即共和制政府仅仅适合于在狭小地域范围内运行。也就是说,只有在范围狭小的地域内,才可能具有同质性的群体和利益,人民才可能对政府产生依恋感。而州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小共和国,是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保障。因此,反联邦党人对联邦主义和州的优先性之辩护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信念上,州和个人权利的保护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保护个人权利是合法政府的目标所在。但是,根据新宪法,目前松散的邦联政府将被强大的中央政府所替代,将极大地威胁各州的主权和独立,难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和财产。他们强调,新组建的政府必须建立在各州主权独立的基础之上,需要服从各州政府,而不是吞并各州政府。正如迪金森所言:“保留各邦政府,让他们具备一定的能力,这点势在必行。……完全废止各邦政府的企图,会降低我国政府的水平,实际不可取,会导致毁灭。”可见,反联邦党人的这种小共和国的信念,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代表制理念。当然,反联邦党人也承认,即使是州政府——他们理想中的共和国——也需要选举代表专门从事立法活动,公民们不可能亲自出席会议进行立法。可见,反联邦党人主要把代表

制视为对直接民主的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并应尽可能的发挥近似直接民主的功能,而代表则应当扮演听命于选民指令或指示的代理人的角色,反映选民的意见和利益。

反联邦党人指出,要保证代表向选民负责并依赖于选民,除了需要相关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如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缩短代表任期,经常轮换代表等,更重要的是代表与选民之间要存有某种相似性,亦称代表性,即议会代表结构要反映社会结构,是社会的缩影。如亚当斯所说:“议会大体上应该是广大民众精确的缩影的画像,议会代表应像人民一样去思考、感觉、推理和行动。”可是,作为政府中唯一的人民代表机构——众议院,宪法却规定每三万人才选举一名代表,显然难以保证代表与选民之间的相似性。而议会代表如此之少,更难以保证各个利益群体都获得代表,并由此造成议会代表性严重不足。反联邦党人强调:“要保证代表制真实且有效,那就应该有足够的代表;他们应该与人民打成一片,思人民之所思,想人民之所想,——要绝对地对人民负责,也要熟悉人民的利益和情况。”理查德·亨利·李在《来自一位美国农夫的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一个完全和公正的代表应该是代表者具有和被代表人相同的利益、情感和观点。代表人应该将被代表人视为他们自己,就如同被代表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一个公正的代表制应该得到良好的设置,以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选举参与其中。立法机构应该容纳来自手工业者,供销商人,农民,机械工人等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代表。这些代表应该充分了解自己所代表人群的利益和需求。因此,代表制所需要的名额应该被安排足够的数量。”更让反联邦党人不满的是,新宪法拟采纳的大选区制度安排将加剧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即议会代表的相似性或代表性缺失。因为大选区制度将使得选民们只选举那些声名远扬的人,即所谓的“自然贵族”。这些人远离选民和选区,难以了解选民的切身感受,选民也没有适当的渠道与代表保持沟通与交流,致使代表可能忽略选民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共和国并不需要所谓的“自然贵

Cecelia M. Kenyon, *Men of Little Faith: The Anti-Federalists on the Natur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12, No. 1, 1955.

赫伯特·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第84页。

John Adams, *Thoughts on Government*, in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Vol. IV, 1850 - 1856, p. 195.

Jonathan Elliot, *The Debates in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s Recommended by the General Convention at Philadelphia in 1787*, Second Edition, Philadelphia, Vo. III, 1896, p. 322.

Paul Leicester Ford, *Pamphlet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Brooklyn, NY, 1888, pp. 288 - 289.

族”,这些贵族不是共和国的福祉,而是一种危险因素。如果连政府机构中唯一的代表人民的众议院都是由这些天然贵族所组成,那根本谈不上是民主。他们指出,只有增加议会代表人数,才能极大增强代表与选民之间的相似性程度。

反联邦党人的代表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实际代表制。这是北美土生土长的一种代表观,曾被北美殖民地用来抗议英国政府不经殖民地议会同意而强制征税的行为,其口号就是“无代表不纳税”。这种代表观要求“立法者必须是本地区的……自由人;他应该短期掌权,在掌权期间接受选民对他的行为的审查;最后,一个地区与总人口应该是按人均分配的关系。”实际代表制的核心要义是:代表必须由选民直接选举,并以维护选民利益为宗旨,严格执行选民的指令,反映选民的心声,主要扮演“传声筒”的角色。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尽管反联邦党人主要是州权主义者,但是,他们强调的实际代表权并不是针对州的代表权,而是针对不同行业和阶层的利益代表而言。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是由多样化的利益阶层所组成,各个阶层的利益只有具有相似经历或背景的人才能感受到,而不会被另一个阶层所切身体会,因此,只有每个阶层选出自己的代表,才能维护其利益。

联邦党人针对反联邦党人坚定的小共和国信念——即共和政府只有存在于狭小的地域范围,以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与小共和国有着天然的关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反驳:第一,目前美国许多大州的地域范围已经超过了他们所想象的小共和国,但这些大州并没有沦为专制政府,反而治理的都很好。而且,就目前美国的地域范围来看,并没有超过共和政府所需要的地理极限,因为“共和政体的自然范围,就是从中心点到达刚好使代表能因管理公务需要而集合的距离。”第二、小共和国存在致命的缺陷,即在面临外来敌人入侵时,难以进行持久抵抗。第三,联邦政府(即大共和国)具有一些小共和国难以媲美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抵御外敌入侵和应对国内党争方面。联邦党人反复强调,新的全国政府并不会毁灭各邦的主权以及篡夺各州的权力,因为常与人民打交道的是各州政府而不是全国政府。因此,人民对各州的依恋感会更强。如汉密尔顿所说:“人性的情感通常是随着对象的距离

或散漫情况而减弱。”因此,新宪法所构造的全国政府的宏图并没有反联邦党人想象中的那样可怕。相反,它能够治愈以往共和政府最容易发生的弊病。与反联邦党人对代表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邦党人认为代表制是大型共和国存在的必要条件,并且强调新构建的美国共和政府与以往的共和政府的最大差异“在于代表制原则,这是美国政府运行的枢纽,且为其他共和政府,至少是古代的共和政府所不知。”因此,反联邦党人不大愿意接受的代表制原则,在联邦党人的政治理念中则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针对反联邦党人的另一个质疑:即众议院人数过少会导致议会代表性不足,以及所选出的代表将主要是“自然贵族”。联邦党人反驳说,议会的主要功能是立法和审议,需要慎思明辨,因此,议会人数不宜过多。就像麦迪逊所说:“为了保障自由协商和讨论的益处,以及防止人们为不适当目的而轻易地联合起来,看来至少需要一定的数目;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人数众多造成的混乱和过激,人数也应该有个最大的限度。”他们认为,议会与选民之间的相似性或代表性,并不足以保证代表维护选民的利益或向选民负责。相反,宪法中规定的代表产生方式将能承担此重任,即经常性的选举,它有利于维持代表与选民之间的依赖和同情。即如麦迪逊所言,“议员对人民的唯一依赖,在于人民有权通过选举新成员来补足偶然的空缺,遇到某些大事还可能进行一次新的普选。”因此,在联邦党人看来,指望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同质性或相似性是难以保障代表向选民负责。另外,代表作为一种职务,对于当选者而言是一项莫大的荣誉,而“每个人的内心对于荣誉、爱戴、尊敬和信任的标志都怀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撇开一切厉害考虑不谈,就是感恩图报的某种保证。”联邦党人进一步指出,拟议中的大选区制度,比小选区更利于选出优秀人才,政客之间的贿赂和煽动也更难以产生效果。而且,议会代表由自然贵族所组成,并没有什么错。因为“每部政治宪法的目的就是,或者说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具有最高智慧来辨别和最高道德来追求社会公益的人。”亦如詹姆斯·威尔逊所说:“代表应当从那些智慧美德卓越之士中当选。如果这就不是所谓天然贵族的意义所指,那我不知道天然贵族所指的是什么,选择这些具有美德才能

沃茨·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麦迪逊、汉密尔顿、杰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7、83、283、270、291、290页。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 House, 1999, p. 386.

卓越之士又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可见,在联邦党人的政治代表理念中,其实渗透着一种精英主义思想。

联邦党人所持有的代表理念是一种实质代表制。这种代表观产生于英国,是伴随议会主权观的兴起而出现。伯克曾对此进行经典阐述,即“受托人虽非由人民选出,但是以人民的名义做事,于是受托人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共享的利益,一致的感情与愿望。这就是实质代表权。”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期那场政治辩论中,英国政府正是借它来为自己的行为(即拥有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合法权力)进行辩护。实质代表制的要旨是:代表在议会中投票要深思熟虑和独立决断,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是公共利益的公正裁判,而不是选区利益的“代理人”。联邦党人的这种代表理念在制宪会议期间已初露端倪,当时,古文诺·莫里斯在反对小邦坚持平等代表权的时候,曾宣称:“他来到这里,是代表美利坚;恕他恭维一下自己,他来到这里,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代表全人类;因为,全人类都会受到这次制宪会议进程的影响。”显然,宪法批准过程中的辩论,只不过是使联邦党人的实质代表理念得以进一步明晰。

### 三

美国制宪过程中的政治代表理念之争,犹如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两者之间那场政治辩论的翻版,都是围绕实质代表理念与实际代表理念展开辩论。不同之处在于: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政府的代表理念之争,主要是围绕代表权或选举权而展开,强调选举权是代表获得合法权力的根据,民众无选举权则无义务纳税和服从议会管辖。而制宪时期的代表理念之争,主要围绕代表性而展开,强调各个行业和阶层必须拥有自己的代表,各州才是人民可靠的依恋之地,由此保证代表

向选民负责。由代表权过渡到代表性的这种转化,其实是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政治环境变化的反映:独立战争之前的政治辩论,主要是为其背叛母国政府辩护,论证其独立的合法性,因此,代表理念更加强调人的权利。而立宪时期的宪法辩论,则主要是为了论证成立一个强固的全国政府的必要性,因此,代表理念更加注重政府的权力。在宪法批准的辩论中,联邦党人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为美国联邦政治制度的建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被公认为美国的“建国之父”。反联邦党人则由于他们成为宪法的反对者而被认为是不合时代潮流和目光短浅的人士。但是,如果单从代表理念而论,反联邦党人无疑是最终的胜利者。戈登·伍德就指出:“在《宪法》制定后之后的二三十年里,反联邦党人关于政府中实际代表制或者利益代表制的概念,……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如果不是到了众口一词的地步的话,在现实中也占了上风。”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制宪时期的代表理念之争,极大地形塑了美国建国之初共和代议制政府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如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参议院议员由间接选举产生,代表各州;众议院由直接选举产生,代表人民;美国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代表美利坚共和国和美利坚民族;司法机关则代表社会正义。因此,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曾说道:“美国制度的突出的政治特点是代议制:地方机构中的代表制,联邦机构中的代表制,国会两院中的代表制。”由此可见,通过考察美国制宪进程中的代表理念之争,我们不仅可以深层次地理解美国宪法的政治意涵,更能明晰美国共和代议制政府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责任编辑:田明孝

Quoted Herbert J. Storing, *What the Anti-Federalists Were F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I, 1981, p. 44.

麦克弗森:《柏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8页。

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第270页。

戈登·伍德:《美国革命激进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8页。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3页。